

李
明
璋
戎
曲
选



李明璋
戏曲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江 流

李明璋戏曲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6,000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3}{8}$ 插页 5

198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册

书号：8069·726 定价：2.50 元

忆 明 璋

(代 序)

席 明 真

胸中无渣滓
笔墨吐清芬
艺坛劳缀锦
文苑失琼英
呕尽心中血
应怜太瘦生
巴山秋雨夜
为君一招魂

明璋去世整整二十年了，就我和他的交情来说，早应该写一点纪念他的文章，也有责任写的。但这多年一直没动笔，这当中当然有着十年浩劫的直接影响，不管怎么说，心里总是歉然地、不，应该说是在责备自己的疏懒。责备尽管责备，但总是没法提笔，不要说提笔，只要一想起我和他前些年一直是在一道工作、特别是在成都修改《和亲记》的情景，心就会沉重起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道工作了。

九月，这座芙蓉城已是满金烁意了。我和他都习惯在晚上

工作的，常常在夜深人静，他会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里，天南海北，随便谈上一阵。有时也会评论到一些当前的人、事，或对当前川剧艺术上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如果他发现我在忙着什么，他就会不声不响地站在我的桌旁，因为人太熟，我对他是相当随便的。当我问他有没有要紧的事，他总是略带歉意笑着说“没有什么”。到我又埋头在稿子当中，他便不声不响地悄然离去……

一想到他那诚朴而又有所倾诉的神情，一想到他清瘦而又文弱的身影，就会想到对他关心不够，心便会一阵悸动，只得废然搁笔。这样多次、多次……。自然，其中也经历着浩劫的十年，磨难的十年，特别是为了那本背着所谓宣传“三和一少”的罪名的《和亲记》。李亚群同志——他当时担任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文艺界同志都亲切地呼之为“亚公”的。他很爱护明璋，这《和亲记》是他的命题，因此期其必成，便要我专程从重庆赶来，帮助明璋作最后修改的。当然，在文革中这就成了“反社会主义”的“秘谋策划”了。熟悉明璋为人的同志都说，幸好他早死了，不然，这个“劫”他是难逃的。死算得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能认真为人民做点事情，死后能在人们谈到工作什么的时候，自然记起他来，这便是“不死”。我认为明璋便是这样。因为现在川剧界一谈起剧本创作，同志们一定会想到明璋来的；特别是在今年的川剧会演期中，川剧界的同志们就多少次谈到他，说如果明璋不死，一定有个剧本参加会演的。尽管明璋是死于病、死于癌，不是那样轰轰烈烈地死得“重于泰山”，然而他是为了川剧默默献身，积劳成疾，鞠躬尽瘁的。这样也绝不是“轻于鸿毛”的吧。明璋死了，作为一个戏曲作家，他是那样年轻，然而人们、戏剧界的同志们，特别是

川剧界的同志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不会忘记他短短的一生，仅仅三十年华，十载辛劳，由于他的勤奋，由于他对党的忠诚，给川剧艺术留下一笔可贵的财富。

这里我不准备对明璋的作品进行分析，写文章肯定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爱憎，肯定作者横溢的才华；他作品摆在读者面前，至今仍演出在舞台上，读者、观众、戏剧界的朋友们，定会给明璋应得的评价。无须要我的饶舌，我只想谈一些我和明璋的认识，以及十多年交往中能够记得起来的生活小事，通过这些小事，让人能对他的为人、品德，他勤奋自学的精神，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勤勤恳恳，让人对建国以来，党所培养的一个青年川剧作家有所了解，对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下，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历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于愿足矣！

我认识明璋的时候，他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文艺青年，但和当时的文艺青年不同的是那样诚朴而谦逊，甚至在陌生人面前还显得有些羞涩。我想，这和他幼年的遭遇，家境零落有关系吧。他父亲早丧，家无恒产，因此中学不到结业就辍学了。为了生活，在他舅舅商店里当学徒，站柜台，学卖茶叶。然而他一直是喜爱着川剧的。他对这座民间的艺术宝库兴趣极大；在旧社会，一个商店学徒的这种爱好，是属于“不务正业”的。这样当然也就不见谅于他的舅父，经常受到舅父的斥责。但却很难改变他这种喜好。他总是设法往那些地方跑，他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孜孜不息地追求着。那些被人称为“下九流”的“扯谎坝”，却是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文娱活动场所，也是使明璋感到充满生活情趣的地方，那些书场、茶馆、河坝头用篾棚围起来的演唱川剧的简易剧场，都少不了他的足迹。他告诉

我，他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想到自己还是个青年。但他没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演员，却总是喜欢“川剧”。他告诉我，他的关于川剧的认识，大都来自这些“扯证坝”。川剧的“江湖十八本”就是在这些简易剧场里，看跑码头的班子演出的。这些地方实际成了明璋学习川剧的启蒙学校。就是由于受到这些艺术熏陶，他不仅爱上了川剧，自然也爱上了旧体诗词。应该说明璋对传统的旧体诗词是有一定素养的。尤其在解放后，正式成为川剧艺术工作者，对这些优秀的传统名作，也成了他终身的职业嗜好。这爱好又直接丰富了他剧本的色彩，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文字幽美，而且借古诗词中的名句来刻画人物，信手拈来，毫不费力，都又恰到好处。如《谭记儿》中，谭记儿和她的情侣白士中在尼庵一见钟情，准备双双出走，白士中老耽心杨衙内不肯善罢干休。谭记儿却是蛮有把握，告诉他，只要轻装简从，扁舟即发，而杨衙内却须前呼后拥，按站启程，等他来吗……这里明璋用了一句李白现成的诗句，而且在艺术上作为帮腔处理，就十分生动，剧词是——

谭记儿 ……等他来吗，我们(帮腔)

轻舟已过万重山……

只这样一句就充分显示了谭记儿的沉着、机智、风趣而又充满信心。对人物的塑造起到积极的作用。真是用得妙。还有用简单的几句七绝，既刻画了人物，又揭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望娘滩》中的恶霸地主周员外的登场就是绝妙的描绘：

“一望无涯好田庄
别人秋收我冬藏
命中自有真富贵
不耕不织乐安康”

好个“命中自有真富贵”，这四句诗活活把恶霸地主巧取豪夺，不耕不织而又享有富贵，且这富贵又是命中注定并为别人无法享用的心理写出来了。这样深入浅出的手法，不是从优秀的古代诗词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是写不出来的。这是明璋对优秀的文学名著学习、积累、融化的成果，这种积累、融化是在不自觉地，长时间地进行着的。我想，明璋也是个自学成材的典型吧。旧社会对他的压抑，使他接近了传统的民间艺术——川剧，而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他的培养、爱护、帮助、教导，使他从一个失学、失业的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秀的青年戏曲作家，一个优秀的川剧作家。

由于这样的经历，对川剧艺术孕育了深厚的感情，重庆解放不久，他就抱着满腔热情参加到一个由艺人自己组成的职业剧团。明璋不是演员，在剧团他是能做啥就做啥，见到啥就做啥，他抄剧本、写海报，甚至台上缺龙套他就跑龙套。这个剧团当时没有固定收入，全靠演出维持生活，当然没有固定工资，他和剧团的演员一道睡舞台，吃大锅饭，而他是毫不计较的。这一段生活虽然清苦，却是给明璋日后从事编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要的是使他学到不少川剧知识，使他懂得了如何同艺人合作，懂得了古老的传统艺术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会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思想力量；特别是老区的一批优秀剧目，移植成了川剧，如《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小二黑结婚》以及新编历史剧《闯王遗恨》、《黄巢起义》……等，象一股刚劲有力而又清新、和煦的春风，吹醒了整个戏曲界，特别是老艺人们真正得到了翻身，不再受人轻贱，而且有了政治地位，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他们对党有发自内心的崇

敬，都有一股强烈的“翻身感”；他们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各种活动，学习党的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参加“戏改”活动，把川剧艺术作为武器，投入了各种斗争行列。明璋尽管不是艺人，也和艺人一道积极投入各种活动，尽管没有固定工资，尽管随大家一道吃大锅饭，但他参加活动是自觉的。他虽年轻，也曾目击旧社会的崩溃、眼看新社会的成长，尤其在这被作为蒋家王朝的“陪都”的山城，从反动派乌烟瘴气下解放出来，开始新生、重建，特别是川剧艺术的回到人民手中，他和川剧艺人一样兴奋，一样喜悦，一样憎恨着旧社会吃艺人血汗的旧制度和恶霸、土豪；他对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发自内心的拥护。当时重庆市成立了“戏曲工作委员会”。他要求到“戏工会”来作点事，而且不计报酬。当时我兼着重庆剧协的工作，为了推动“戏改”，报道和配合戏剧界的各种活动，剧协办了一张小报《观众报》，刊登评论，也刊登一些短小的剧本，不论是创作或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明璋和赵循伯就都是《观众报》的积极投稿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同志后来都先后参加了四川省川剧院，而且都成了川剧界知名的作者。明璋则更是年轻作者中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佼佼者。

这时期，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川剧界投入了这股国际主义的洪流，明璋也十分振奋，这伟大的时代给了他不少的崭新的感受，他为《观众报》写了不少的短小的唱词，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开始用川剧这一艺术形式结合着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写了一出小戏《护士与伤员》。《观众报》发表了他的剧本，西南川剧院的前身——“又新剧院”组织了演出，尽管剧本还显得幼稚，但这是一个可贵的起点，他懂得了艺术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际主义服务。明璋接着提出了他的创

作计划：他准备采用民间传说的一个神话故事——孽龙，改为川剧，他和朱禾、李华飞合作，征求我的意见，要我支持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不错，帮助他们解决了下生活的一些问题。明璋决定到这个传说的来源地灌县，去搜集资料，去访问一些了解情况的民间艺人。他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他们，由明璋执笔，写成了一出神话故事剧——《望娘滩》。由明璋所在的那个剧团组织了演出。剧本具有强烈的爱憎，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吸引了山城观众，获得了好评。重庆文联组织了一次创作评奖，《望娘滩》获得了一等奖。同时，其他剧种也加以移植，上演，这对明璋是极大的鼓舞。不是么？一个旧社会的失学青年，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由于党的指引、培养，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用明璋的话来说叫“请纓有路，报国有门”。从此大大激发了明璋的创作热情，在他年轻的、短短的一生中，他积极、热情、不计名利，勤勤恳恳，投身于川剧事业。朋友们善意地嘲笑他，说：李明璋写剧本忙得来恋爱都顾不上。的确，明璋是没有女朋友的。

一九五六年我到四川省川剧院工作，我要明璋和我一道去成都，到省川剧院去搞专职编剧。他欣然同意了。当时明璋继《望娘滩》之后，在大约三年时间在剧团吃大锅饭、睡舞台的艰苦条件下，写出了《谭记儿》、《夏完淳》、《袄庙火》等多幕戏。其中尤以《谭记儿》为著，获得了全国戏剧界的一致好评。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移植为《望江亭》并亲自演出。一九五九年明璋随川剧出国团来京，君秋先生便约会了明璋，君秋先生以戏曲界老一辈艺术家的身份对一个青年作者的关怀、鼓励，使明璋在创作上更加努力。记得成都市川剧院在北京首场演出是由著名川剧名演员杨淑英饰谭记儿，易征祥、李笑非分

别扮演白士中、杨衙内，演出获得成功。前辈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先生对剧本和演出予以高度评价，而且在演出结束时十分热情地站立起来，带头鼓掌。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热情赞赏的评论文章。首都戏剧界的热情鼓励很不寻常。明璋对此十分振奋。当时我正和省川剧院一团在贵阳作访问演出，明璋也和我一道，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我们就在贵阳组织排练，由已故的表演艺术家刘成基担任导演，并饰演其中杨衙内一角。由陈书舫、曾荣华、戴雪如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刘成基在导演处理上有不少的创造。这对明璋在写作上有很大的启发。

明璋到四川省川剧院工作后，遇上全国性的工资调整，明璋原来参加那个剧团没有固定工资，当然也就没有级别。也没有学历，资历浅，这得重新评定。因为他是新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员，群众评议，给定了个文艺十三级。这和当时剧院的专职编剧相比，有的同志认为是差距悬殊，我也觉得是低了。明璋尽管是新参加革命队伍，但在编剧上是作出了成绩的，而且已是全国知名的青年戏曲作家了。但明璋不同意，也是在深夜，他来我家，劝我不要给他定级太高——其实何曾太高？和明璋的工作成就相比，那怕再升三级，也不算过份的。但明璋一再说服我，说他没有负担，说他只单身一人，说他还年轻，说他还有稿费收入，等等，一句话，他要求别给定得太高。直到最后他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代表着党在剧院工作的，不能给党的威信带来损失。明璋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给我谈过话，这话使我愕然而憬悟，我突然记起明朝杨升庵的两句话：“见义不敢后人，临利不敢先人！”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么！不计名利，不考虑个人，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多么纯朴

的心灵！多么高尚的情操！我怎么也不能不依了他。

不久，更进一步证实了明璋坦率的襟怀，心中毫无渣滓：

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展了，一开头就有人来动员明璋，要他起来揭发剧院在评级问题上压制了他。说是“排斥党外知识分子”。而且说他和我最接近，由他起来揭发是最有力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一如既往，深夜，我习惯地在书桌面前坐下，但不是写作，也不是读书，而是沉思着……明璋进来了，他悄悄地站在我的桌旁，但不是默不做声，而是激动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我告诉他，党既然号召整风，他看到有什么违反党的政策，可以谈，尽管谈。他说，党是不会排斥知识分子的。以他为例，他在旧社会是个走投无路的知识青年，由于党的指引，党的培养，他找到了应走的道路。明璋有时候也很固执的，尽管在生人面前不大说话，甚至有些羞涩，但他识大局，顾大体，心是向着党的。我曾经问过他对党的态度，他告诉我，追求马列主义真理是他毕生的目的，但他感到，要成为党员，现在的差距还很大，他自我鉴定是“不合格”。足见明璋对自己的要求多么严格。

他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心扑在创作上，常常通宵写作，一句唱词没改好都不放笔。要检验他一夜的辛劳，只消看他的茶缸子、烟缸子，茶缸子的茶叶几乎漫到杯口，而烟缸子呢，却是垒尖尖的烟蒂。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叠稿笺……。为此，我曾写诗笑过他：

通宵达旦苦经营，
烟袅茶凉睡不成；
写成一曲“红鸾袄”^①，

① “红鸾袄”为高腔曲牌名。

“红鸾”依旧一孤星^①。

说明璋是重艺术，因而当时连婚也未结；说他只知有人，不知有己，我想，这不会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吧。有这样一件小事可证：

在成都平原，不少青年都喜欢骑自行车，一是解决交通问题，一是有益而有趣的运动。于是见猎心喜，明璋也去买了一部车。因为他骑车的技术不佳，大家都劝他不要骑上街去，免出事故，他也接受这个规劝。但时日一久，他又想到街上去试试。他也作了预防措施，给自己订下四条下车的规定：一是人多下车，二是车多下车，三是逢弯下车，四是十字路口也要下车。听了他的“四下”之后，大家又劝他不如干脆推着出去，推着回来。就这样他首次上街，就出了事故：一辆飞车横冲直撞，在丁字路口把他撞翻在地。而这肇事者收车不及也同时倒下。明璋摔得不轻，路人都为之不平。可他从地上爬了起来，急急忙忙，却是一跛一拐地向肇事者走去，大家以为他是去找那人评理，殊不知明璋却是去慰问那人，问他摔伤没有；问他的车摔坏没有？这出人意外的一笔，引得围观者轰然发笑。当肇事者却在这笑声中带着满脸愧色走开之后，明璋才蹒跚地去扶他摔倒的车子。朋友们对此引为笑谈者久之，笑明璋过于迂、酸。迂也罢、酸也吧，这是明璋的本色，这种纯朴、这种赤子之心，是贯彻在他的短短一生中，贯彻在他的作品中的。不是么，《望娘滩》中得宝、化龙的聂郎，在获得宝珠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度日艰难的乡亲、四邻。《夫妻桥》中的何先德、何娘子，为解决老百姓的困苦，不计自身的安危，甚至献出自己的

① “红鸾”即红鸾星。

生命。《丁佑君》中的丁佑君，为了保护群众，不屈伏于敌人的屠刀。爱人民、爱党、爱社会主义，这在明璋是经受新旧社会的变革、亲身体会而养成的品德，这种品德在他的作品中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明璋律己甚严，在生活上很简朴。解放初期在剧团吃大锅饭、睡舞台的艰苦情况也可以说建国初期，物质条件较差，大家如此，但到省川剧院工作以来，条件不同，环境改善，明璋仍旧是自奉甚简，从没向组织要求过任何条件。令人叹惜的是在困难年月，当时成都市长李宗林同志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多次送给他的罐头食品，他很少食用，也从没在人前炫耀过，一古脑儿放在床下箱篋中，直到明璋去世，收拾遗物，才从床下翻了出来，见到一箱子罐头食品，想到明璋的嶙嶙瘦骨，禁不住催人泪下……

党对明璋的器重，明璋是深深地感到的；但他从不以此来向人民、向组织索取任何荣誉、地位和物质享受。明璋由渝来省川剧院工作后，特别受到亚群同志的重视。亚群同志曾到省川剧院宿舍看望明璋，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写作。此事不仅明璋感动，戏曲界不少同志也为之振奋。当然，这种举动在老同志是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而明璋却更自谦抑、从未在人前炫耀过。我知道他，他是非常珍惜党对他的爱护之情的。

同样，明璋一生和艺人合作，是十分珍重他们的意见的。在我的记忆中，在谈到传统剧目时，总能不厌其详地听取艺人的意见。由于传统剧目大多是由艺人的“口传心授”，代代相因，保留到今，难免师承各异。又因为河道、流派的不同，剧本就算有着抄本，也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而明璋却能按照“双百”方针来处理，不因为河道、流派不同，而影响记录、整理。

在对待自己的创作上，更是虚心听取艺人的意见，反复修改，尽管他不是演员，缺少舞台经验，但他的剧本不仅文情并茂，而且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动作性强，更难得的是具有川剧风格，这与虚心向艺人学习有直接关系。因此终其生在与艺人共事上，没有发生过不可解决的纠纷。在川剧界，明璋算是“善与人交”的，这种交往却是不同于社会上所流行的“拉关系”，而是待人以诚，相交以礼，总的是为了“川剧”这一个目的取得同志们的信任。

明璋在川剧事业上是有贡献的，但明璋去世太早！他去世那年才三十五岁。

党对明璋一直是十分关切的，这个爱护、关切，明璋是感到了的。他和朋友谈起总是十分激动。

就在明璋去世前半年，他的病情为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同志和阳翰生知道了，他们告诉中国戏剧家协会，把明璋接到北京来疗养。当告诉他这个决定时，他十分激动，同志也为他高兴。他高兴地来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由于心情舒畅，病势有了缓解。他又高高兴兴地回到成都，完成了他最后一部戏《李存孝之死》的修改。

《李存孝之死》是根据关汉卿的《邓夫人哭存孝》和黄吉安的《困邢州》改编的。对戏的初稿，同志们有些争议，特别是对李存孝在邢州的处境，李存孝所选择的对策。为此，明璋曾数易其稿，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不必让剧中人自己来说，而是要通过剧中人的行动，通过艺术处理表现出来的。我觉得这道理是无可非议的。这最后一次修改，明璋保留了自己的原意。他对这个觅取封侯的牧羊少年的遭

遇，是充满着同情的。剧本改出来可能依然还有着不同的看法，那就留下个问题让大家议论吧。

戏的最后结尾，他找我研究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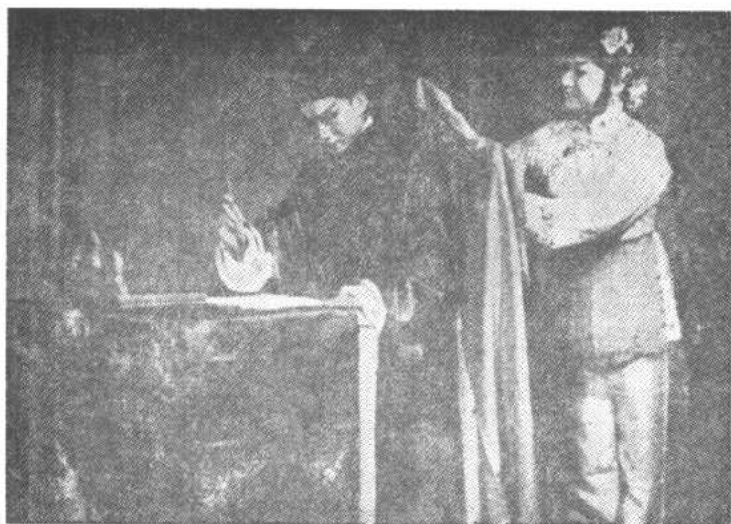
……李存孝夫人，一身缟素，身背存孝骸骨，在漫天风雪中，单人、独骑，悄然远去、远去……伴随着的是一声清怨的高腔乐曲……

这是明璋留下的最后一部剧作，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然而又是悲壮的场景……

“牧羊少年觅封侯，
刹那人生三十秋！”

我已记不清楚这是不是明璋的原词了？因为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年，这不平凡的二十年，已是明璋一生的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我想，如果明璋还在，他定会再给这伟大的历史时代留下些雪泥鸿爪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北京远望楼



第一场《树志》
何娘子（杨淑英饰）
何先德（蓝光临饰）

夫 妻 桥 （川剧·高腔）



第四场《桥断》
吴泽江（司徒慧
聪饰）
戴婆婆（静环饰）